

# 独立音乐人兴起对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冲击与重塑

苏爱民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 全罗北 全州 54896)

**摘要:**近十余年来,数字音频工作站、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媒介的普及,显著改变了音乐生产的组织方式与权力结构。与以唱片公司为核心、以资本前置投入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传统音乐生产模式不同,独立音乐人依托低成本数字工具和平台分发机制,得以在创作、制作、发布和传播等环节获得更高自主性。本文基于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从生产主体、资源配置、传播机制和价值评价四个维度,考察独立音乐人兴起对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影响。研究认为,独立音乐人的兴起并未终结工业化音乐生产,而是推动音乐生产权由机构单中心控制转向创作者、平台与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再分配格局;唱片公司则由前置性控制者逐渐转为后置性资源整合者。与此同时,平台算法与流量规则又形成新的中介结构。由此,当代音乐产业正在形成“个体发起—平台验证—工业接续”的混合生产生态。

**关键词:**独立音乐人;音乐生产模式;数字媒介;平台化;产业转型

## 引言

近年来,音乐产业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谁能做音乐、怎样把音乐送到听众面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发生了改变。传统音乐行业的制作音乐作品必须经过一系列非常烦琐且复杂的步骤才可以完成,需要经过谱曲作词、专家配器、歌手录音、制作母带、灌制磁带、广告宣传、市场销售等必须过程,而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从而导致音乐制作成本不断高涨<sup>[1]</sup>。

随着数字音乐平台的普及,独立音乐的传播和发行变得更加便捷。这些平台不仅提供了在线音乐播放和下载服务,还为独立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作品和与粉丝互动的机会。数字音乐平台的兴起,使独立音乐人可以更加自主地掌控自己的作品发布和宣传,也使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独立音乐<sup>[2]</sup>。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独立音乐人从边缘创作群体逐渐转化为活跃的行业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独立音乐人的兴起并不只是创作主体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触动了传统音乐生产机制内部长期稳定的权力关系。原本集中在唱片公司、制作人和媒介渠道手中的创作选择权、制作决定权与传播主导权,开始部分流向个体创作者及平台系统。

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生产主体、资源配置、传播机制和价值评价四个维度展开讨论。本文的核心判断是:独立音乐人的兴起并没有使音乐生产从“工业体系”走向“非工业体系”,而是促使音乐产业从机构单中心控制转向“个体发起—平台验证—工业接续”的混合生态。

## 一、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结构特征

传统音乐生产模式是在现代唱片工业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核心并不只是“做出一首歌”,而是围绕作品形成一整套可复制、可放大的产业流程。就其总体特征而言,至少可以从工业化分工、资本主导和市场导向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传统模式具有鲜明的工业化分工色彩。在唱片工业体系中,一首音乐作品通常要经过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母带、包装、发行等多个环节。不同岗位各司其职,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保证了作品在技术层面上的完成度。正因如此,传统工业体系能够持续输出制作水准相对稳定的流行音乐产品。不过,这种高效率也意味着创作过程会逐步朝向流程化和范式化。某些被市场反复验证有效的结构、和声走向和情绪推进方式,会在生产中被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工业审美”<sup>[3]</sup>。

唱片公司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组织与分配资源的中心位置。谁能够进入录音棚、谁能获得宣传

---

**作者简介:**苏爱民(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学。

预算、谁能被推送给更大范围的受众，往往都与机构的判断密切相关。创作者若缺少机构背书，往往难以越过高昂的制作成本与传播门槛。

与此相应，传统音乐生产模式还形成了一套商业结果的评价机制。销量、榜单、媒体曝光与市场回报通常被视为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而技术规范与商业表现也常被默认捆绑在一起。久而久之，制作精良、包装完整、传播强势的作品更容易获得“优质”的评价，至于那些制作资源不足、但表达上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则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也正是在这一结构限制之下，独立音乐人的崛起才显得格外具有突破意义。

## 二、独立音乐人兴起的驱动机制与对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冲击

### （一）独立音乐人兴起的驱动机制

随着数字音频技术的进步，音乐创作经历了从传统模拟设备录音向高度集成化的数字音频工作站（DAW）的深刻转型。媒介技术介入音乐文化传播流程，仿若催化剂一般，带给音乐创作无限发展空间<sup>[4]</sup>。所以独立音乐人能够在这些年快速成长。

过去，音乐制作高度依赖专业录音棚、硬件设备和团队协作，成本较高，普通创作者很难独立承担。而随着数字音频工作站、AI、虚拟乐器、采样音源以及家庭录音设备的普及，个体创作者已经能够在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从写作、编曲到基础混音的完整流程。科技的发展，让更多人有了更为便捷做音乐的路径。

总体来看，独立音乐人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当代音乐生产条件变化后的必然结果。技术降低了门槛，平台打通了路径，审美则提供了接受基础，三者共同塑造了独立音乐人得以生长的现实土壤。

### （二）对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冲击

过去，一首歌能否被广泛听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是否愿意投入资源。如今，作品在平台上的表现、用户自发传播的热度以及社交讨论的活跃度，越来越可能先于资本判断发挥作用。

在传统的电视音乐形式中，音乐与视频结合比较紧密，音视频创作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由专业的视频制作团队紧密结合音乐的内容进行视频创作。在音乐发行过程中，电视音乐发行同步进行。而在短视频平台的音乐创作中，独立音乐人的音乐作品与视屏的结合都是由自己完成，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独特性。这是短视频平台赋予用户的功能，也正是这种功能，使得音乐能够以多种视频形式呈现。有些音乐人创作的内容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和记忆效果，并使其成为网络热点，使音乐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播<sup>[5]</sup>。

独立音乐人的出现提升了创作者的主体性。传统体系中，创作者往往需要在机构规则和市场预期之间不断妥协；而在新的平台环境下，越来越多音乐人可以先建立个人风格和受众基础，再决定是否与商业体系合作。也就是说，个体创作者不再只能被动等待产业分配机会，而是具备了主动塑造职业路径的可能。

因此，独立音乐人带来的冲击并不是局部的、表层的，而是深入到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组织方式、价值结构和运行逻辑之中。

## 三、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重塑路径

如果说前一部分回答的是独立音乐人为何能够兴起，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改变了传统音乐生产模式中的什么。本文认为，这种变化并非对旧体系的简单替代，而是围绕生产主体、资源配置、传播机制和价值评价展开的一次结构性重组。

### （一）生产主体由机构单中心转向多主体协同

在传统模式中，创作、制作、宣发与发行通常彼此分离，并由唱片公司或大型制作机构统筹完成。独立音乐人的兴起，则使个体创作者能够以“个人”为核心整合多个环节，形成更灵活的项目制和小团队式生产组织。音乐生产不再只能依赖大型机构启动，而可以先由创作者发起，再根据需要接入混音、视觉、宣发等专业协作环节。

独立音乐人的意义，不在于彻底取消分工，而在于改变了分工的组织权归属：过去由机构主导分工，如今越来越多地由创作者根据项目需要自主组合资源。

## （二）资源配置由资本前置转向数据验证后的后置放大

传统唱片工业倾向于在作品正式进入市场之前进行资本筛选：只有被机构看中的创作者，才可能获得制作预算、媒介资源与发行渠道。独立音乐人兴起后，这种顺序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作品先由创作者以较低成本完成并上线，再通过播放量、评论反馈、社交扩散和用户二次创作等方式接受市场验证，机构则在作品已显示传播潜力后再进入合作<sup>[6]</sup>。

在这一逻辑下，唱片公司和经纪机构并没有消失，而是逐步由“前置性控制者”转向“后置性资源放大者”。它们更倾向于在作品和创作者已经获得初步受众基础之后，通过版权运营、商务合作、巡演组织和跨媒介推广等方式实现进一步放大。这样一来，机构的角色从“决定谁有机会出现”转向“决定谁能被进一步规模化”。

## （三）传播逻辑由渠道控制转向平台分发与社交扩散

传统音乐传播高度依赖电台、电视、唱片销售网络与主流媒体曝光，传播通道相对稀缺，且由机构把控。平台时代则显著改变了这一格局。音乐作品不仅可以作为完整文本在流媒体平台传播，也可以在短视频场景中以片段化、可模仿、可二创的形式进入更广泛的社交传播链条<sup>[5]</sup>。这意味着，音乐的传播单元不再只是“整首作品”，还可能是某一段副歌、某种音色、某一句歌词或某个易于复制的情绪节点。

## （四）价值评价由单一工业标准转向复合判断

在传统模式中，技术完成度、包装和商业回报常常构成评价作品的主要尺度。独立音乐人的兴起，使价值判断标准出现明显松动。越来越多听众愿意接受那些在制作上未必高度精致、却具有鲜明个人经验、叙事温度和声音辨识度的作品。真实感、个人性、圈层认同与情绪共鸣，逐渐成为与工业完成度并行的评价维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评价体系已经退出。相反，播放量、收藏量、分享率、评论活跃度等平台数据，正在成为新的可量化指标。

## 四、案例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独立音乐人与传统生产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结合若干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人发展路径进行讨论。

陈粒第一张专辑《如也》，这张专辑制作相对“粗糙”，但是很多歌曲底色很不错，如《走马》《奇妙能力歌》等，情感真挚，写出了那个年代部分年轻人情感共性的内容。在火了之后，陈粒之后的专辑制作水准就完全提升到了另一个级别。直到现在，部分歌曲有了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的色彩。陈粒的成长轨迹较能体现独立创作向专业化升级的过程<sup>[7]</sup>。

毛不易的走红也具有相似意义。他早期创作中的编配并不复杂，但歌词表达与叙事情绪高度集中，因而迅速引发听众共鸣。毛不易医院实习期间创作《感觉自己是巨星》《消愁》等，简单的编曲，但作品的底色很真挚，直到参加明日之子走红。走红之后作品开始精细化制作<sup>[8]</sup>。

赵雷的发展路径同样具有典型性。其早期通过酒吧现场演出积累听众群体，并在此期间创作了《画》《南方姑娘》等歌曲。后来借助中国好歌曲与我是歌手媒介曝光进入主流视野。这一过程表明，独立音乐人并非天然与主流市场对立，相反，他们往往先在较小范围内完成风格确认，再通过平台、综艺或商业合作实现传播层级的跃升。赵雷的歌词很写实，离生活很近，他也能捕捉到大家在音乐情感需求上的共性，容易同广大听众共情<sup>[9]</sup>。

国外音乐人中，Ed Sheeran 的经历也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其早期以街头演出和个人化创作方式建立独特风格，直到通过《The A Team》走红，与顶级制作人合作（如 Rick Rubin 等）编曲更加流行化、国际化。这说明，不论中外，独立音乐人与工业体系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像一种动态流动，而非绝对割裂。

Billie Eilish 早期以独立音乐人身份，与哥哥 Finneas 在卧室录制作品，《Ocean Eyes》上传至 SoundCloud 后意外走红。其低语式唱法与极简电子编曲迅速吸引关注，随后被唱片公司签约并发行专辑，凭借独特审美与风格完成从独立音乐人到主流巨星的跃升。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独立音乐人的价值并不只在于“脱离传统机构”，更在于他们改变了音乐进入市场的起点。过去是机构先筛选、再让听众接触；如今往往是听众先作出反应，机构再决定如何接入。这种顺序变化，恰恰揭示了音乐生产逻辑的深层调整。

## 五、结论

综上所述，独立音乐人的兴起是数字技术普及、平台机制扩张与审美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意义并不只在于音乐人身份构成发生变化，更在于传统音乐生产模式中关于“谁能生产、谁来分配资源、谁决定传播、谁定义价值”的既有秩序被重新组织。

本文认为，独立音乐人对传统音乐生产模式的影响，不能简单概括为“替代”或“颠覆”。更准确地说，它促成的是音乐生产权由机构单中心控制向多主体协同配置的转变：个体创作者在前端拥有更强的发起能力，平台在中端承担更高的筛选和扩散功能，传统机构则在后端发挥资源整合与规模化放大的作用。由此形成的，是“个体发起—平台验证—工业接续”的混合生产生态。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重塑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权力平等。平台算法、流量依赖与版权规则正在形成新的约束条件，独立音乐人的“独立性”因此始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对流行音乐研究而言，这提示我们不能再仅以传统唱片工业逻辑解释当代音乐生产；对音乐教育与创作实践而言，则意味着未来更应重视创作者在表达能力、技术能力、媒介意识和产业理解等方面的综合培养。

### 参考文献：

- [1] 饶潇. 数字音乐背景下中国音乐人的困境与出路浅析[J]. 今传媒, 2011(6):145-146.
- [2] 常景博. 数字化时代独立音乐的发行研究[J]. 当代音乐, 2024, (06):180-182.
- [3] 汪月波. 论音乐产业[J]. 人民音乐, 2017, (02):76-79.
- [4] 刘果, 文非凡. 社交媒体赋能下流行音乐传播路径研究[J]. 融媒前沿, 2025, (06):42-47.
- [5] 陈雪东. 短视频平台的音乐传播方式及特点分析[J]. 电声技术, 2020, 44(11):51-53.
- [6] 江凌, 傅晓敏. 试论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价值链结构的视角[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20, (02):116-123.
- [7] 余媛媛. 陈粒新民谣的意义生产[J]. 艺术广角, 2018, (02):76-80.
- [8] 肖瑶. 音乐人毛不易的走红原因分析[J]. 乐器, 2024, (06):108-111.
- [9] 贾宛烨. 当代青年亚文化社会心理探寻——基于语料库的赵雷歌词话语分析[J]. 大众文艺, 2021, (02):147-149.

## The Impact and Reshaping of Traditional Music Production Models by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Musicians

SU Aimin

*(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Jeonju, Jeonbuk 54896, South Kore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s,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short video media has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the organizational methods and power structures of music production. Unlike the traditional model centered on record companies, which relies on upfront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pecialized labor division, independent musicians have gained greater autonomy in creati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rough low-cost digital tools and platform-based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This stud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musicians on traditional music produc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production entities, resource allocation,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and value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musicians has not ended industrialized music production but has instead shifted the control of

production rights from institutional monopolies to a redistributed model involving creators, platform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Meanwhile, record companies have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upfront controllers to post-production resource integrators. Additionally, platform algorithms and traffic rules have formed a new intermediary structure. Consequently, the contemporary music industry is evolving into a hybrid production ecosystem characterized by "individual initiation—platform validation—industrial continuation."

**Keywords:** Independent musicians; Music production models; Digital media; Platform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